



“道中生活”

——怒江傈僳人的日常生活 与信仰研究

Revive Me in Your Ways

A Study of Lisu People's Daily Life and Religious
Practice in Nujiang River Basin

卢成仁 著

人民出版社



“道中生活”

——怒江傈僳人的日常生活 与信仰研究

Revive Me in Your Ways

A Study of Lisu People's Daily Life and Religious
Practice in Nujiang River Basin

卢成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毛 淳 肖 辉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中生活”——怒江傈僳人的日常生活与信仰研究/卢成仁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3835-0

I. ①道… II. ①卢… III. ①傈僳族-社会生活-研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②傈僳族-信仰-研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IV. ①K285.6②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9004 号

“道中生活”

DAOZHONG SHENGHUO

——怒江傈僳人的日常生活与信仰研究

卢成仁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5

字数:325 千字

ISBN 978-7-01-013835-0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研究	1
第一节 “基督教中心”研究模式与被忽略的文化主体	7
第二节 基督教与边地少数民族社会整合	11
第三节 作为日常生活的基督教信仰	15
第四节 文献与问题	21
第五节 本书的结构安排	39
第二章 娃底村落历史与基督教信仰概况	42
第一节 傈僳族简况	43
第二节 娃底村的源起：“化外之地”、国家与村寨	47
第三节 自然环境	56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58
第五节 亲属结构与通婚圈	62
第三章 体味与基督教传播进程	68
第一节 从有到无的“烟酒味”	69
第二节 再次出现的“烟酒味”	72
第三节 货币化进程加速与“烟酒味”	74
第四节 烟酒味与身体感	81
第五节 “烟酒味”与社会结构变动	84

第四章 礼拜仪式下的劳作与生活	91
第一节 一周三次的礼拜活动	92
第二节 家屋与基督教仪式活动	102
第三节 礼拜仪式与日常劳作	113
第四节 祷告会与农时	119
第五节 农闲与基督教节日	125
第五章 个人宗教经验与日常生活中的祷告	130
第一节 个人宗教经验与基督教信仰	133
第二节 宗教经验与社会组织	136
第三节 作为阈限的宗教经验	140
第四节 祷告的功能	143
第五节 宗教经验、祷告与村落生活	149
第六章 婚姻、性、“中秋会”与基督教信仰	152
第一节 教会与婚姻仪式	154
第二节 婚姻制度与基督教信仰	161
第三节 性观念、基督教规训与“中秋会”	165
第四节 “性/性别平衡机制”与基督教信仰	170
第七章 礼拜的座位与教会的组织	175
第一节 教会的组织形式	177
第二节 信徒的捐献和教会的事务	183
第三节 “左右对坐”	186
第四节 “前后有别”	190
第五节 传统等级制度与教会组织原则	195
第八章 仪式社区：三大节庆与跨村落仪式	198
第一节 节日与跨村落庆典仪式	202

第二节 跨村落仪式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211
第三节 仪式的组织	214
第四节 跨村落仪式与通婚圈、市场行为、仪式象征	218
第五节 作为村落组织形式的基督教仪式	222
 第九章 日常生活与基督教信仰	229
第一节 “中国中心”或“少数民族中心”研究范式的转换	229
第二节 东方学与内部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娃底傈僳人基督教 信仰	231
第三节 日常生活中的基督教信仰	236
第四节 日常生活的宗教维度	240
第五节 生活宗教与基督教信仰	243
 附论：明星广告、“赫耳墨斯”与田野报告人 ——合作民族志的一种可能	251
第一节 拟剧与“表演”	253
第二节 村民与我	256
第三节 “合作报告”	259
第四节 回应与反思	263
 附件一：国内外傈僳族研究文献评述（1931—2009）	265
附件二：嘎拉布村（啊兰甲教堂）感恩节庆典仪式过程 （2009年10月2日—10月5日）	300
 参考文献	307
后 记	319

第一章 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研究^①

小时候每年都会去度暑的外婆家,在浙江南部的一个海滨渔村。星期天的早晨,当朝日从海上喷薄而出的时候,海滩边上总会有一长串朝日映照下的人影,向海湾边山岙上的教堂迤迤而去。傍晚的时候,这一长串人影又会踩着夕阳的余晖,缓缓地回到渔村。我也跟着表兄弟们,走在这一长串的人影中,因为星期天的渔村特别安静,而在山岙教堂边上有很多小伙伴可以一起玩耍。每当教堂里传出肃穆而优美的赞美诗声时,我们的目光总会不自禁地望向教堂。2006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云南怒江的福贡县^②,当透过车窗看到山顶教堂上高耸的十字架时,不禁有些错愕,眼前的场景竟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而滇西北的山地与浙南海滨的人文、地理差异不知凡几。带着尚未发酵的“文化震撼”,我匆匆地进入了村子。当天晚上,当我还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娃底村教堂传出了唱诗班排练赞美诗的歌声,一如小时候在渔村中听到赞美诗的反应,不禁抬头向教堂的方向望去。不过,与小时候不同的是,这一次我走进了教堂。从东南的海滨,到西南的山地,基督教(新教,以下类同^③)一直在我的生活中映现,而对于西南山地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的研究,也让我对自己一直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及其宗教背景,能有一次重新理解与反思的机会。

① 本文按人类学惯例,对文中所涉及的人名均做技术性处理。

② 福贡县所属的怒江峡谷,因基督教信仰人数众多而有“福音谷”的称誉。

③ 在汉语学术话语中,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狭义的基督教只指新教一种,本文中所指的基督教仅指新教而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①)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了西方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关系。^②近年来“温州研究”热潮中^③,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基督教对沿海温州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与当下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④ 但对于一个在温州地方社会氛围

① 对于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按惯例在第一次出现时标以外文,其后出现时如无特别需要,皆以中文表示。

②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费孝通先生深入阐述“温州模式”之后(参见费孝通:《“江村”到“温州模式”》、《温州一瞥》、《小商品 大市场》,《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7、423—427、452—470页),对于温州及其地方文化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开始发足,并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我个人不完全的统计而言,1986—2006年之间,仅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与温州相关的研究论文就达13篇(参见张翔:《合会的信息汇聚机制——来自温州和台州等地区的初步证据》,《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张建君:《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比较苏南和温州的不同实践》,《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王晓毅:《村庄内外——温州宜一村调查》,《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李明欢:《“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项鹰:《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鹰:《“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张敏杰:《温州“第二次创业”考察》,《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朱成堡:《温州农村民居的区域文化特征——以苍南县为例》,《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凯弟:《温州宗教情况的调查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罗涵先:《温州农村乡镇经济的面面观——浙南农村小城镇调查》,《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6期;之农、征雁、易处:《小城镇建设在温州农村商品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20小城镇的调查》,《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2期)。而与温州相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专著自1998至2011年约有十一本(如[美]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项鹰:《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郁建兴、王诗宗、黄红华:《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郁建兴、江华、周俊:《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郁建兴、黄红华、方立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林亦修:《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任柏强、方立明等:《移民与区域发展:温州移民社会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陈剩勇等:《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周辉、何华湘:《宗族村落文化的范本:温州永嘉岩头金氏宗族村落文化研究》,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

④ 关于基督教信仰与温州经济发展之间较为直接的研究,主要有曹南来对于基督教信仰与温州企业家信徒,特别是与其企业发展及运作之间良性互动的深入观察和分析(Nanlai Cao,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者而言,来到云南,除了有兴趣关注为什么同样的基督教文化没有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发展出相应的市场经济精神?创造出像温州那样的经济优势?更有兴趣关注的是,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基督教,进入到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中,这二者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大规模的所谓的“文化涵化”^①;理论上讲作为外来动力之一的基督教是这一涵化过程中的主动者,少数民族是受动者,作为受动者的少数民族如何因应基督教这一强势文化,并将其纳入到本民族文化体系中去?作为普世宗教的基督教在地方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基督教的地方化是如何在其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的?如果我们愿意暂时放下地方化、本土化的议题设置,先来看基督教信仰与少数民族村落日常生活具有怎样的关联?这一关联,又如何使得基督教信仰成为其组织社会的微观基础?而这一问题(在悬置地方化、本土化“基督教中心”的逻辑预设之外,亦能有效回应地方化、本土化的理论关切),是本研究希望着力去理解和阐释的主要问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开始传入我国,以中国为对象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则更早于这个时间。^②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走过了从沿海到内地、

2010.);赖小科对于基督教信仰与信徒商业行为之间关联进行讨论后,认为信徒个人及其之间共同的经济伦理促进了其所办企业的发展(赖小科:《苍南基督教对其教徒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万江红、王时珍对温州农村基督徒个人之间的商业借贷行为进行了调查,认为基督教信仰促进了这一民间直接借贷的发展(万江红、王时珍:《基督教对农村民间直接借贷行为的影响——基于对瑞安农村的个案透视》,《商场现代化》2006年总第462期);莫法有、林虹对于温州宗教世俗化现象的理解,也部分涉及了基督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莫法有、林虹:《从温州宗教现状看宗教的世俗化》,《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1期)。另外,一些研究也间接讨论了基督教信仰与温州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焦淑军讨论了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对于温州地方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参见焦淑军:《宗教信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探悉》,《理论观察》2006年第1期);任映红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文化对于温州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参见任映红:《温州村落社区宗教文化及其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此外,任映红也认为基督教在温州农村社会建设中具有其积极意义(参见任映红:《宗教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以温州上村为例》,《中国宗教》2007年第11期)。不过,对温州经济发展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联,进行富于创见的观察,并有严谨且深刻之解释的研究,应属杨美惠对于经济发展与温州“礼仪经济”过程的讨论[参见Mayfair Yang(杨美惠):《“温州模式”中的礼仪经济》,何宏光译,《学海》2009年第3期];换个角度看,杨美惠所应用的“礼仪经济”的讨论框架和“自主存在”的人文性解释脉络,同样也可以应用于温州基督教信仰及其过程的分析。

① [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施惟达、胡华生译,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9—69页。

②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从内地到边疆、从汉人社区到少数民族社区这样一个过程。基督教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汉语学术圈中研究的一个热点,从宗教哲学出发,到跨文化比较,再到实证研究等,角度不一,成果显著。但与中国整个基督教研究氛围和议题的热烈相比,对于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的研究,显得相对落寞。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留下的一些传教士著作、日记、相关文章^①,与后人对这些传教士的研究^②,是少数民族基督教研究比较早

① 对于传教士的著作、文章、日记等的翻译工作,较早就已展开(参见[法]许让神父(Schram L. L.):《甘肃土人的婚姻》,费孝通、王同惠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东人达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邵慕廉(Frank. J. Dymond)等记录性的著作(参见[英]塞缪尔·柏格理、R. J. 邵慕廉:《苗族纪实》,东人达译,《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1、3期;2000年第1、2、3期。威廉·H. 哈兹佩斯:《石门坎与花苗》,东人达译,《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3、5期)。同时,东人达也编辑、整理和翻译了与贵州石门坎传教士有关的著作合集(参见[英]柏格理、邵慕廉、王树德(William. H. Hudspeth)、甘铎理(R. Elliott Kendall)、张绍乔(R. Keith. Parsons)、张继乔(P. Kenneth. Parsons):《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延续上面的讨论,在对传教士文章、著作、日记等的翻译工作之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其思想、行为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如游建西、赵文娟、刘振宁、李昌平等从不同角度,对柏格理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参见游建西:《从交流中走出贫困——对1904年基督(新)教徒柏格里在石门坎传教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赵文娟:《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刘振宁:《文化本位 跨际书写——柏格里视野中的汉民族及其文化形象探析》,《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李昌平:《柏格理留下的精神和遗产》,《中国民族》2007年第1期)。另外,杨曦对柏格理和朱焕章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杨曦:《柏格理与朱焕章教育思想之比较——兼论民族教育的内源发展》,《民族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东人达也对以石门坎为中心滇黔川边传教士的族群身份及其阶级归属进行讨论,从而希望更好地来理解其精神和行为(参见东人达:《基督教滇黔川传教士的民族及阶级归属》,《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不过,对于西南传教士的研究并不仅限于石门坎,如黄修义分析了传教士对于西南地区彝族教育的影响(黄修义:《论近代外国传教士对彝族教育的影响》,《民族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耿静对传教士在羌族地区的传教及医疗卫生与文化活动有详细的说明(耿静:《在羌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马林英讨论了美国传教士柯饶富(Ralph Covell)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传教过程(马林英:《基督教浸礼宗在凉山彝区的传播历程及背景——以美国传教士柯饶富经历为例》,《民族学刊》2011年第2期);陈建明对传教士为西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情况进行了阐述(陈建明:《传教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字创制活动》,《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4期);另外,周蜀蓉也对传教士与西南边疆学术研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周蜀蓉:《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同样,对于传教士群体及其传教过程与影响的研究,也不仅仅限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对甘肃(参见房建昌:《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陈声柏、王志庆:《一位传教士眼中的甘南族群关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陈改玲:《再论外国传教士近代来甘南的传教活动》,《甘南高师学报》2005年第1期;陈声

期的讨论领域。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足的,从历史学^①、人类

柏:《近代甘南地区的基督教传播》,《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1 期)、新疆(参见魏长洪:《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3 期;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西方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西域研究》2001 年第 4 期;郭益海:《近代新疆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传教活动评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4 期;木拉提·黑尼亚提:《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世界宗教研究》2005 年第 1 期)、海南岛(参见王禹:《传教士在海南岛》,《清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等民族地区传教士的研究。

① 历史学角度的研究(关于云南基督教传播历史方面文献将放在下文中来具体梳理,此处从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基督教传播的历史过程进行阐述和研究;如郎伟对基督教在川南苗族地区传播的叙述(郎伟:《天主教、基督教在川南苗族地区传播述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6 期);张坦对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在贵州西北部地区传播过程的比较(张坦:《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在黔西北苗彝地区传播的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1 年第 6 期);东人达对英国圣经基督教会在滇黔川边区传播过程的分析(东人达:《圣经基督教会在其在滇黔川的活动》,《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1 期);华方田对黔西北苗族地区的基督教传播与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说明(华方田:《黔西北苗族地区的基督教传播及其社会历史背景》,《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6 期);高应达对基督教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进行了叙述(高应达:《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铜仁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东人达对基督教滇黔川边区传播的整体叙述和研究(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邓杰对基督教社会服务组织与边疆社会改良进行了讨论(邓杰:《基督教与战时西部边疆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学生会暑期服务团活动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第 6 期);邢亦尘对基督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邢亦尘:《论基督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 年第 6 期);王静对基督教在海南苗族地区的传播进行了叙述(王静:《基督教在海南苗族聚居区传播始末》,《新东方》2002 年第 2 期);唐戈对鄂温克族与拉祜族基督教不同的传播过程、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唐戈:《基督教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传播——鄂温克族与拉祜族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5 期)。二是对信仰基督教原因的分析(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其自身学科视角出发的原因探析,关于这一部分的讨论下文会有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如韦启光从当时政治状况、教会社会事业、宗教本身等角度对黔滇川边区苗族信仰基督教的原因进行分析(韦启光:《黔滇川边区苗族信仰基督教试析》,《贵州社会科学》1981 年第 4 期);程昭星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视角来分析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原因(程昭星:《天主教基督教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原因》,《民族研究》1992 年第 4 期);曾蒙军对贵州苗族信仰基督教原因进行了简要的讨论(曾蒙军:《贵州苗族信仰基督教的历史原因浅析》,《贵州文史丛刊》1990 年第 4 期);孙诗锦、林芊也分别对石门坎苗族信仰基督教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参见孙诗锦:《试析基督教在云贵川边区苗族传播的原因》,《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4 期;林芊:《石门坎现象:对清末黔西北苗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4 年第 3 期);而东人达将石门坎基督教信仰的原因归结到信仰群体本身,并将其作为主体因素进行理解(东人达:《论近现代黔滇川基督教运动中的主体作用》,《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2 期)。另外,黄家理也对壮族地区的基督教传播原因进行了分析(黄家理:《基督教传入壮族地区原因试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年第 6 期)。三是对历史过程中基督教传播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如吕延涛、邹晓辛对基督教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吕延涛、邹晓辛:《基督教的传播与近代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6 期);岑秀文对贵州威宁苗族社会中的基督教影响进行叙述(岑秀文:《试论基督教对威宁苗族的影响》,《贵州民族研究》1983 年第 1 期);王曼对基督教在黔西北苗族地区文化变迁中的影响进行了细致

学与民族学^①角度,对少数民族基督教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

的分析(王曼:《清末民国时期黔西北苗族地区的文化变迁》,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高翠莲)。除了以上从社会文化影响角度的分析之外,也有就某一个类别的影响进行的专门讨论,如张恩耀、颜勇、丁万录等对基督教之于苗族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参见张恩耀:《基督教对苗族文化教育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颜勇:《历史上石门坎苗族教育反思》,《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丁万录:《基督宗教对苗族教育的影响分析——以贵州石门坎为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李世平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基督教对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李世平:《试论西方宗教对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孟铸群等则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教会教育进行了叙述(孟铸群、陈延湘、史波:《抗战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教会教育》,《民族教育研究》1991年第2期);另外,方慧、胡兴东对基督教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方慧、胡兴东:《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传入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东人达对西南少数民族教会“不吸鸦片”戒律的社会影响及其所具有的信仰本土化的标识意义进行了详细讨论(东人达:《西南基督教会“不吸鸦片”戒律探讨》,《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① 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大部分与云南少数民族有关,下文会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此处从略),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如宫玉宽分别从历史与现状、思想观念影响、文化教育影响等方面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在当代贵州赫章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宫玉宽:《贵州省赫章县少数民族基督教现状》,《宗教与民族》2004年总第3辑);符耀新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自封“传道人”现象进行了分析(符耀新:《广西民族地区自封为基督教“传道人”非法活动透视》,《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卢秀敏、秦和平对黔西北赫章、威宁民族杂居地区的多块村和Y镇农村的教派及基督教与地方文化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卢秀敏、秦和平:《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汉杂居地区传播的现状调查——以贵州赫章、威宁的两个村落为研究个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宫玉宽从文化形式、传统伦理、传统风俗、认同等四个方面对朝鲜族教会和苗族教会进行了比较研究(宫玉宽:《中国少数民族基督教会之比较研究——以朝鲜族教会和苗族教会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黄瑾用“复合文化”来解释贵州威宁地区彝族基督教信仰的发展过程(黄瑾:《复合文化:基督教背景下的彝族文化变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胡展耀从历时的角度对贵州巴拉河流域的南花苗族村基督教信仰过程进行了调查(胡展耀:《基督教在巴拉河流域苗族社区的传播历史考——基于对南花村的调查研究》,《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张霜也以历时的纵向比较为背景,对当下石门坎教育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张霜:《贵州石门坎苗族教育人类学田野考察》,《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3期)。除此之外,张坦对石门坎苗族的基督教信仰做了深入的阐释与理解(参见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孙杰也从宗教管理的角度对北京朝鲜族的基督教信仰进行了调查(孙杰:《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朝鲜族基督教信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金炳镐)。二是除了田野调查之外,亦有应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概念和视角对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如戴斌武从社会心态的角度讨论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戴斌武:《近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社会心态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东人达从杀牲、婚姻彩礼、酗酒等经济因素,分析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东人达:《近代西南少数民族基督教运动的经济动因》,《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同样,吴道军认为物质和心理短缺是石门坎苗族基督教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吴道军:《近代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兴起原因之个案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果,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然而,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的研究能为中国基督教研究带来的启示和进路(如以边缘的少数民族基督教多重处境和多元传播路径,来重新思考和理解中心的汉人地区基督教传播,从而得出更具整体性和穿透力的认知与理解),一直被人们所忽略。

而以 1877 年传教士麦嘉底(John M. Carthy,又译麦卡悌)徒步进入云南为界^①,基督教传入云南的历程,也大致经历了由汉人社区到少数民族社区的过程。云南地处边陲,与东南亚诸国山水相连(东南亚山地与云南在同一季风圈影响之下)。因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传播进程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仅有内地到边疆、汉人社区到少数民族社区这样的历程;也有东南亚境外基督教教派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直接传播,如传教士富能仁(James O. Fraser)、巴托(Ba Thaw)^②等就是由缅甸进入云南^③,在傈僳族地区传播基督教。因地理和区域位置而来的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传播特点,也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基督教传播版图中占有独特地位。

第一节 “基督教中心”研究模式与被忽略的文化主体

宗教研究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渐成“显学”,这与经济高速发展但未如预期那样给人们带来所需要的幸福感,却伴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有着一定的关系。宗教信仰重新在人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宗教研究一部分的基督教研究,不仅有上述因素的存在,也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比较的背景

申晓虎认为基督教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应用“文化挪用”的策略,从而有助于其之传播与本土化(申晓虎:《文化的挪用:西南少数民族信仰变迁中的基督教影响》,《民族学刊》2011年第2期);何嵩昱也认为英雄情结、神系观念等文化特质方面的因素是石门坎苗族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因(何嵩昱:《“石门坎现象”与苗族文化关系研究——从苗族文化特质角度探析石门坎现象产生的内在动因》,《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3期)。

① 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61 页。

② 巴托为缅甸少数民族传教士(一说为克伦族),一些汉文文献也将之写为:巴拖、巴叔。

③ 李福珊:《怒江宗教概览》(怒新出 2002 准印字第 05 号),2002 年,第 67 页。

中,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体用双行”、“强国利种”的近代化背景下,作为一种外来的强势文化力量存在于中国学术研究的体系中。从一定程度上看,现代学术体系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基督教的推动和引介。^①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界,随着对基督教与西方现代化关系的认知,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背景下,基督教研究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也变成宗教研究中的重点之一。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因素之下,基督教研究也走过了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大多是以基督教为中心,从传教士研究^②到教会大学(教育)的研究^③;从基督教文化哲学^④到与中国本土思想比较^⑤

① 参见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②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建道神学院1998年版;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段怀清:《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何绍斌:《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俞强:《近代沪港双城记——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在沪港活动初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叶隽:《主体变迁: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谭树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林立强:《晚清闽都文化之西传:以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为个案》,海洋出版社2010年版;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 参见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的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泉:《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尹文涓:《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肖会平:《合作与共进: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对华活动研究(1922—1952)》,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徐以骅:《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及和中国文化融合的讨论^①；再到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影响及改良、重

④ 参见尹大贻：《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傅安乐：《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张志刚：《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范明生：《晚清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卓新平：《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年版；卓新平：《基督宗教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许志伟：《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董江阳：《“好消息”里的“更新”：现代基督教福音派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刘时工：《爱与正义：尼布尔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孙毅：《个体的人：祁克果的基督教生存论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杜丽燕：《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徐弢：《托马斯·阿奎那的灵魂学说探究：从基督教哲学角度的一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赵林：《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谢志斌：《公共神学与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伦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赵士林、段琦：《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梁卫霞：《间接沟通：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石敏敏：《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汪咏梅：《理性、浪漫主义与基督教：C. S. 路易斯神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20 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孙尚扬、刘宗坤：《基督教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⑤ 参见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0 年版；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 1992 年版；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何世明：《从基督教看中国孝道》，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姚新中、赵艳霞：《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颜炳罡：《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吴言生：《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华书局 2005 年版；郭清香：《耶儒伦理比较研究：民国时期基督教与儒教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何除、林庆华：《基督教与道教伦理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毛丽娅：《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比较研究》，巴蜀书社 2007 年版；龚道运：《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刘树森：《基督教在中国：比较研究视角下的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① 参见邢福增：《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1860—1911）》，建道神学院 1995 年版；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何世明：《基督教儒学四讲》，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何世明：《融贯神学与儒家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罗秉祥、赵敦华：《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陈建明、何除：《基督教与中国伦理道德》，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章开沅：《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庄祖鲲：《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余国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中美基督教交流十五年回顾与思考》，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李志刚、冯达文：《文明对话：儒学与基督教》，巴蜀书社 2009 年版；陈奇佳、宋晖：《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杜小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构^①。基督教作为研究的中心,被作为事件中的主体存在进行分析和讨论。在“基督教中心”的研究模式中——以基督教为行为主体,以中国社会为背景和行为受体——相对忽略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能动性,也忽略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主体作用。因而,在这一研究模式中、在“刺激—反应”的科学化场景中,中国社会文化被动地对基督教作出回应。不但中国社会被视若无睹,居于边缘的少数民族更被视为可有可无,对于少数民族基督教的研究,也不能够充分显示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

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领域或者说民族研究领域,少数民族社会都是作为一种“异文化”而存在——少数民族作为“他者”存在于学术研究体系中。不过,作为人类学术语的“他者”,一般用来指称被研究的异文化群体,这种被研究的异文化群体常常有别于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背景,隐藏着“简单文化”和低于研究者自身之文化这样一种隐而不张的理论预设。而在对过往民族研究的回望和反思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研究场域,不但将少数民族群体和文化视为“他者”,在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华夏中心主义”学

① 参见余牧人:《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上海广学会 1942 年版;陈秀萍:《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佟洵:《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陶飞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李峰:《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性位秩:以华南 Y 县 X 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 年—1927 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陶飞亚:《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邢军、赵晓阳:《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与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吴梓明、李向平、黄剑波、何心平等:《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左芙蓉:《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巴蜀书社 2009 年版;[美]李树熙:《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雷春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刘天路:《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王莹:《身份建构与文化融合:中原地区基督教教会个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